

丁一凡 著



「中国战略家」丛书

跌宕起伏的中欧关系

——从文明对话到战略伙伴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战略家』丛书

跌宕起伏的中欧关系

——从文明对话到战略伙伴

丁一凡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跌宕起伏的中欧关系：从文明对话到战略伙伴/丁一凡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1

ISBN 978-7-5203-5678-7

I. ①跌… II. ①丁… III. ①中外关系—研究—欧洲

IV. ①D822.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252086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张 林
特约编辑 宗彦辉
责任校对 夏慧萍
责任印制 戴 宽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2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9.5
插 页 2
字 数 279 千字
定 价 10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中国与欧洲的关系源远流长，很难用一个维度讲清楚。但中国与欧洲的关系无疑又是人类世界最长久而又非常重要的关系，因为它不仅无法限定在互相带来利益的贸易，也无法限定在互相交流带来的好奇，还有互相结盟的冲动，也有互相羡慕及攀比的内在动力。

中国与欧洲的交往与互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人类在科学技术、文化认知、经济与社会发展领域的进步，尽管这些互动关系并非总是平等与对等的。总体来讲，古代中国无论在文化还是科技及生产领域都领先世界，因此中国成为欧洲向往的“圣地”，欧洲启蒙思想家想象出来的中国模式成为推动欧洲思想及社会运动的重要背景。然而，当欧洲率先实现了工业化后，却忘记了自己“师傅”的恩德，反过来想把中国与印度这些东方文明的代表踩在脚下，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东方的大门，把印度变成了殖民地，也差点把中国弄成它们的殖民地。欧洲列强从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并包装出了一种“欧洲中心论”，不仅抹杀了过去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对欧洲文明崛起的贡献，而且要让这种“西方天生优越”的思维定式固化成为一种永远统治世界、包括永久统治遥远的中国思想界的一种工具。好在历史是发展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这句民间谚语可能最好地总结了历史变迁的逻辑。

在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对外来的文化与技术都不屑一顾，认为中国自己生产的文化与科学技术才是世界最好的。孔子云，“故远人不服，



则修文德以来之。”这充分表明，中国的文人觉得，中华文化可以教化外面世界的落后民族。奇怪的是，当中国被欧洲列强痛打了之后，却一下子失去了自信心，认为自己什么都不如人。中国的知识分子把中国挨打的原因归纳为“落后”，而“落后就要挨打”成为近代中国的一句至理名言。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崇洋媚外”成为一些中国知识分子的习惯。他们习惯把海外的奇闻怪事、奇谈怪论当作自己与没见过海外世界的中国人吹牛的资本，不断地放大海外的“文明程度”，贬低自己同胞的“素质”与“水准”。这些习惯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以至于“改革开放”后，一批跑到欧美国家学习先进经验又回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仍然不时地会陶醉于这种操练。

其实，在中国最悲惨的那些年月，欧洲知识分子中仍有一些人坚定地认为，中国人的文明程度是欧洲人所望尘莫及的。比如，20世纪20年代中国还在各路枭雄的一片内战中挣扎时，英国哲学家罗素到中国巡回讲演。在对比中西文化后，他讲道：“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有哪个国家‘骄傲得不屑一顾’，那这个国家肯定是中国。中国人天生就具有宽容友爱、以礼待人、礼尚往来的态度。如果中国人愿意的话，他们会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中国人只是追求自由，而无意于‘支配’。如果其他国家逼迫中国为自由而战，那么他们可能会尝到帝国的滋味而失去自己的美德。”^①

而且，罗素还把中国知识分子到欧洲去寻找“强国之路”的努力大大讥讽了一把。他说：“中国人到西方寻找知识，满怀希望能打开通往智慧的大门（我想这是枉费心机）。西方人到中国去有三个目的：打仗、赚钱和传教。虽然传教的目的具有理想主义的美德，并激励了很多人去过英雄般的生活，但是军人、商人和传教士都在把我们的文明强加给世界其他国家，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三种人都是好战之徒。中国人却并没有强迫我们学习儒家学说。他们认为，宗教虽多，但其理一以贯之。所以不会干涉我们。中国人很有经商头脑，但是他们的经商之道不同于在中国的欧洲商人。欧洲商人总是不断寻求特权，垄断权，以及在中国修筑铁路和开采矿产的权利，并以坚船利炮作

^① [英] 罗素：《罗素论中西文化》，杨发庭等译，北京出版社2010年版，第90页。

为要挟。中国人照例不是好的战士，因为他们自知师出无名。不过这仅仅是他们通情达理的一个证据。”^①

无论如何，中国是从欧洲那里学会了现代的科学技术原理，才懵懵懂懂觉得中国也需要向欧洲那样进入现代社会，学会工业化，学会现代化。应该说，中国在挨了欧洲的打后，才痛定思痛，认真地当了一回学生。但中国是个好学生。在经过了半个世纪的社会动荡——革命、内战、被侵略、抗战、再内战之后，中国终于稳定了下来，开始重新从制度到现代工业化上再建国家。然后，在发展的道路上，中国自己又犯了一些“冒进”和激进的错误，走了一些弯路，浪费了一些时间。但自从1978年中国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后，用了40年时间，很快地实现了工业化，很快地进入了现代化。可以说，我们把西方工业化的过程浓缩了5—6倍。

中国近些年的发展有目共睹，让许多过去一贯俯视中国的西方知识分子也不得不重新寻找定义中国的逻辑框架。而中国人最终也可以平视欧洲，可以正常梳理中国与欧洲的交往历史，也可以更好地理解我们自己发展的历史了。如此，我们便可以尝试着打破一些“迷信”，比如“落后就要挨打”。其实，中国在历史上并不总是被更先进的力量打败的。当中国科技、文化都先进的时候，也会被落后的民族打败。宋朝被打败就是如此。

根据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汉朝经济占世界的26.2%，宋朝的GDP占世界的22.7%。

按照宋朝的生产能力与技术能力，中国的水平远超世界各国，更不要说周边邻国了。宋朝已经发明了火药，在战争中武器也占有一定优势，因此在守卫开封时，还用火器打败了金国的骑兵。

宋朝的城市人口比重超过了20%，非农业税比例超过80%。非农业税的比例越高，意味着制造业和服务业越繁荣。宋朝时期藏富于民的现象真实存在。宋真宗时期的宰相王旦曾说过：“京城资产，百万贯者至多，十万以上，比比皆是”。一户宋代中产的财产大约是汉代时中产家产的10—30倍。后代

^① [英] 罗素：《罗素论中西文化》，杨发庭等译，北京出版社2010年版，第91—92页。



的明朝人也承认“宋之富盛，过今远已”。此外，宋朝百姓可以很好地享受生活，他们也有“黄金周”休假日。据宋人笔记《文昌杂录》记载，宋朝官员可以享受公共休假 77 天，可以结社出远门，可以上茶坊品茶，可以到瓦舍勾栏看表演，可以批评官家不必担心被问罪。

然而，宋朝也运气欠佳。宋朝赶上了全球气候变冷的“小冰河期”，北方民族在气候变冷的情况下不断南侵。宋朝不得不先后同北方来的各种少数民族交战，先是与契丹的辽国交战，后又与从更远的北方下来的女真人金国交战，最后亡于蒙古人多年的进攻。宋朝与蒙古打了 40 多年，从抵抗蒙古人的入侵来说，是抵抗的时间最长的了。蒙古军队三次西征。第一次用 6 年灭了花刺子模，占领了中亚及南亚的一部分地区；第二次用 7 年，攻占了钦察、鞑罗斯、匈牙利、波兰等国家与地区；第三次用 8 年占领了木刺夷（今伊朗）、阿巴斯王国（今伊拉克）、叙利亚与部分埃及地区。相比之下，宋朝的抵抗还是很强悍的。

世界历史上也是一样，先进的文明被落后的部族打败的历史也不少。罗马帝国就是毁灭于蛮族入侵。而且，蒙古骑兵曾经横扫西部，打到阿拉伯与欧洲世界，屠城、灭国的事没少发生。若不是蒙古大汗蒙哥在四川的钓鱼城身亡，西征的蒙古各部争先恐后地撤军回来以争夺汗位，世界历史恐怕就要改写了。

如此看来，19 世纪，欧洲列强是利用了中国当时的分裂，利用了当时最大的满汉民族矛盾，看准了清朝统治者的软肋下手。从这一角度看，马戛尔尼率领的英国代表团就是一次火力侦察之旅。欧洲列强打探清了中国的各种矛盾，利用这些弱点去打击中国，才取得了成功。因此，当我们分析当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时，也不必总是“言必称西方制度优越”，而是要更客观地看待世界历史的发展，承认虽然社会结构性的原因是引起社会变化的主要原因，但各种偶然因素对世界历史变迁的影响也绝不应该被低估。

分析中国与欧洲的关系，我用了四种维度：文明对话、战略结盟、科技交往、经济贸易交往，最后又用了一章分析了中国与欧洲关系中一系列奇特



又难解的问题。这些问题使中国与欧洲的关系在结构上处于一种难解难分之势，双方必须合作才对大家都有好处，但各自却又无法彻底清除合作中存在的许多障碍，因为双方的发展都受制于各自的历史发展轨迹，都受各自内部政治、经济、社会因素的影响。因此，即使有时欧洲与中国的政治精英、国家领导人都达成一致时，在推进具体合作中仍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欧盟想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而未果的事就是前车之鉴。我们必须客观、公正地来看待这些中国与欧洲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努力使中国与欧洲的关系朝着对我们双方都有利的方向去发展，才能使这种关系长久维持下去，使中国与欧洲的交往成为人类不同文明之间有益交往的典范，成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参照。

丁一凡

2019年3月于北京海淀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东西方两大文明的碰撞与相互影响	1
一 马可·波罗游记打开了欧洲人窥视中国的窗口	2
二 鸡同鸭讲碰撞出的火花	8
三 中国模式对欧洲的影响	22
四 欧洲中心论与东方专制主义的诞生	35
五 欧洲列强在殖民世界中也瓜分了中国	57
六 清朝曾想努力学习西方制度	70
七 中国的反弹：排外情绪与抵抗运动的崛起	75
八 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	81
九 改革开放与欧洲模式	90
第二章 地缘政治需求与战略结盟	99
一 欧洲很早就想与中国结盟	100
二 中法建交的冲击波	112



三 一个世界理论与联合第二世界	120
四 尼克松访华引起欧洲国家与中国建交的连锁反应	127
五 中国与欧共体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130
六 中国与欧盟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39
七 重建欧亚大陆桥与“一带一路”	144
第三章 欧洲与中国的科技交往	155
一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传入欧洲的影响	156
二 欧洲传教士将现代科学引进中国	167
三 洋务运动的是与非	181
四 留欧学生对中国现代科技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188
五 欧盟应该放弃零和博弈的思维	196
第四章 中欧经贸关系的恩恩怨怨	204
一 中欧之间的贸易不平衡由来已久	205
二 英国也曾经派人从中国偷茶叶与技术	214
三 清朝政府不得不向欧洲列强借债	219
四 欧洲人控制了中国的海关与金融	223
五 民国时期的中欧经济关系乏善可陈	230
六 改革开放与中欧经济合作	235
七 欧洲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242
八 欧洲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支点	247



第五章 中欧复杂的合作关系	254
一 欧盟为何没能解除对华武器禁运?	254
二 中欧双方的期待落空成为中欧关系中的不和谐因素	270
三 欧中关系面临的不确定性来自何方?	277
四 欧盟与中国的关系能否“与时俱进”?	286
五 欧盟为何是中国的重要伙伴	292

第一章 东西方两大文明的碰撞与相互影响

中国与欧洲的关系源远流长，它们虽然远隔千山万水，却始终保持着某种联系。根据西方的传说，古罗马时代欧洲就有一个兵团到过中国并遗失在这里。后来，又有传言说，在中国的西北部发现有些人是蓝眼睛、黄头发，似乎是某种返祖现象，也许就是那些古罗马人的后裔。但因为缺乏文献支撑，传说总归还是传说。

总的来说，中国文化代表着东方人的智慧，欧洲的文化代表着西方人的智慧，这两种文化是人类文明中大部分时间里占据主导的文化。在古代，无论从知识储备、技术装备、生活与生产水平及文化生活上讲，中国都领先世界。当欧洲商人发现中国后，这个富裕国家的传说引发了欧洲人对中国的各种遐想。欧洲的启蒙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幻想中国的思想运动。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都是拿那些到中国来传播天主教的传教士们的书信作依据来评论中国，但他们的结论却大相径庭。欧洲的工业化触发了欧洲人的扩张主义心态，他们开始到全世界搞殖民主义，并把原来他们的崇拜偶像——东方也当作了占领的目标。英国占领了印度并把印度当作了它的殖民地，在鸦片战争打败了清朝后，也想把中国当成殖民地。在殖民世界的同时，欧洲列强也



瓜分了中国。

清朝时期的中国人认识到自己的落后，反过来要学习欧洲制度，但为时已晚。西方思想进入中国后，加剧了汉人对满清统治的不满，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后，掀起了革命的洪流，最终奠定了新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础。经过了几次政治运动的反复，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进程，而欧洲这回又成为中国开放中最重要的因素。中国的企业改革、宏观经济治理，无一没有欧洲经验的影子。应该说，欧洲与中国的文化在历史中碰撞，互相影响。有的交流是通过和平的商路来进行的；也有的交流是通过暴力的不平等条约来进行的。

一 马可·波罗游记打开了欧洲人窥视中国的窗口

中国对西方的兴趣，似乎比西方对中国产生兴趣要更早一些。汉朝时，张骞出使西域，虽然是为了寻找战略同盟，共同对付匈奴，但也发现了并带回了許多西亚地区特有、而中原没有的特产，还发现了与中原不同的文化。

在张骞西行后不久，一条通商之路便被开辟了出来，从汉朝以后中国的丝绸已经开始通过这条商道运往西方，直至罗马帝国。

但是，西方人对中国的理解，恐怕也只限于那是个产“丝”的地方，因此把那地方称作“赛丽斯”。中国有史料说，罗马人曾在6、7世纪派使团来过中国。但欧洲却找不到这样的证据。

直到蒙古崛起，蒙古大军向西一路披荆斩棘，横扫欧洲大陆时，欧洲人才开始重视从东方来的力量，才开始试图与蒙古人接触，从而发现了中国的存在。



1219年，成吉思汗西征花刺子模，1237年拔都和1253年旭烈兀这两位蒙古人的领袖又组织了两次西征。通过这些远征，蒙古人征服了东自中国、西抵多瑙河畔的大片土地，东西交通也因此畅行无阻。在蒙古人统治欧亚大陆这段时期，后来被人们称为“丝绸之路”的商路成为沟通东西方文明的主要通道。从13世纪初到14世纪中叶的100多年间，欧洲的商人、传教士前往东方的，真是“道路相望，不绝于途”。马可·波罗便是一位既肩负着宗教结盟使命又怀有商业抱负的威尼斯商人，而他留下的《东方游记》无疑给欧洲打开了一个窥视中国的窗口。此后，到遥远东方的中国去“淘金”成为欧洲探险家们乐此不疲的活动。

对于中世纪的欧洲来说，远东和东南亚在经济上十分重要。那里盛产的香料不但可以在无制冷设备的时代用来保存食物，还可以给腌制不佳的食品增添浓烈的香味。这些香料，包括胡椒、桂皮、丁香、姜、肉豆蔻，加上檀香木和染料等其他物产，都是气候比较温和的欧洲所不生产的，主要由阿拉伯的中间商经海路输往西方。如果贸易因故中断，香料的价格就会暴涨，有时甚至可以代替白银或黄金充当支付手段。

除了香料这些必需品外，远东的一些奢侈品也颇受欧洲人的青睐，比如丝织品和瓷器。远东的丝织品主要通过波斯中间商经由陆路销往欧洲。商业的巨大利润，驱使着欧洲人去远东探险，蒙古人建立的疆域广大的统一国家又扫清了交通途中穿越各国国境的障碍，结果便可想而知了。不过当时人们在去远东的长途跋涉中，无论经由陆路或海路，通常都进行“滚动式贸易”。这种贸易的方法是先把货物运到第一个集散地，在那里脱手后就地购买新货去下一个集散地。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多数市场的规模很有限，商人们除了经营前面所说的那些货物外，都喜欢经营产地不远而又享有盛誉的产品。



这个方法的好处是可以确保原始投资有所盈利。如果把一批新货运到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在那里又不受欢迎，那就有可能连经商的老本都要赔掉。将买和卖不间断地交替进行可以避免遭受这样重大的损失。毫无疑问，波罗一家也是这样做的，不过他们经营的是全世界都感兴趣的奢侈品——宝石，他们对成交很有把握。

在马可·波罗之前，应该有很多欧洲人已经抵达过遥远的东方国度，也偶尔有此方面的游记问世。但他们的声音都十分微弱，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马可·波罗则不同，他的书一出版后就迅速地传播开来，被译成多种语言。欧洲人阅读了他的游记，了解了如同神明般的忽必烈和他统治下的中国；了解了日本，那个当时被叫作日出之国的国度。

欧洲人将视野扩展到了亚洲这片神秘的大地上。马可·波罗在书中记载了他与叔叔和父亲在中国居住了将近 25 年的生活经历。不仅如此，在字里行间，他也提到了欧洲的生活，因为每当他谈起这些遥远国度中让他震惊的事物时，都会感慨自己的国家在这些方面的匮乏。正是这些描述驱动了欧洲人对东方的想象和关注——先是震撼，而后是渴求。

1271—1295 年，马可·波罗同父亲和叔叔取道亚洲，来到中国。他的父亲和叔叔是威尼斯商人，之前就到访过中国，并受到元朝皇帝忽必烈的热情款待，还受其之托给罗马的教皇带去了信件。对这个主动到来的异国问候，教皇感到十分高兴，并再次派遣他们给忽必烈送去了回信。这次，年轻的马可·波罗与他们同行。正如马可在书中所说的，他们一路拜访了许多“让我们惊奇的，闻所未闻的”的国度。沿途考察了这些国家的物产并记录了下来，作为以后进行商业贸易的准备。到了中国之后，这三个威尼斯人发现，这个国家安宁祥和，百姓彬彬有礼，他们的住所四周绿树成荫，道路宽阔。马



可·波罗说，他们“原以为会遇到一群野蛮人，最后却发现那里的人民拥有高度的文明，他们的品德和收入都比我们的国民高很多”。值得一提的是，忽必烈将他们留任身边 20 年。而在了解他们返回故乡的强烈愿望后，（还特意）将护送蒙古公主远嫁波斯的任务交给了他们，以示自己的信任。

回到意大利后，马可·波罗参加了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的海战，不幸战败被俘，被囚禁在这座城市里，并在监狱中遇到作家鲁斯蒂谦（Rustichello da Pisa）。于是后来才有了这本由马可·波罗口述，鲁斯蒂谦记叙的游记。

《马可·波罗游记》的主要内容是关于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游纪实，兼及途经西亚、中亚和东南亚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全书以纪实的手法，记述了他在中国各地包括西域、南海等地的见闻，记载了元初的政事、战争、宫廷秘闻、节日、游猎等等，尤其详细记述了元大都的经济文化民情风俗，以及西安、开封、南京、镇江、扬州、苏州、杭州、福州、泉州等各大城市和商埠的繁荣景况。第一次较全面地向欧洲人介绍了发达的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将地大物博、文教昌明的中国形象展示在世人面前。

在《马可·波罗游记》中，还有专门的篇章谈元代通行的纸钞和中国使用已久的煤。马可记述，忽必烈在京城设有造币局，先以桑树皮制造纸张，然后以它制造纸币，这种纸币不但通行国内，就是在和外商贸易中也有流通。他还说到，在中国北方亲自见到“有一种黑石，采自山中，如同脉络，燃烧与薪无异，其火候且较薪为优”。毫无疑问，这说的就是中国境内蕴藏丰富的煤炭。其实，以煤作为燃料，自汉代便已经开始盛行。马可·波罗当时还当作“奇异事物”来记述，说明欧洲直至 13 世纪用煤还并不普遍。

《马可·波罗游记》是欧洲人撰写的第一部详尽描绘中国历史、文化和艺术的游记。16 世纪，意大利收藏家、地理学家赖麦锡（Ramusio）说，1299



年《马可·波罗游记》完成，“几个月后，这部书已在意大利境内随处可见”。1324年马可·波罗逝世前，《马可·波罗游记》已被翻译成多种欧洲文字，广为流传。现存的《马可·波罗游记》有119种各种文字的版本。在把中国文化艺术传播到欧洲这一方面，《马可·波罗游记》具有重要意义。西方研究马可·波罗的学者莫里斯·科利思（Maurice Collis）认为，马可·波罗的游记“不是一部单纯的游记，而是启蒙式作品，对于闭塞的欧洲人来说，无异于振聋发聩，为欧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和视野。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导致了欧洲人文的广泛复兴。可以说，马可·波罗和他的《马可·波罗游记》给欧洲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马可·波罗游记》打开了欧洲的地理和心灵视野，掀起了一股东方热，激发了欧洲人此后几个世纪的东方情结，对15世纪欧洲的航海事业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许多人开始涌向东方，学习东方，致使欧洲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革。许多中世纪很有价值的地图，是参考游记制作的。许多伟大的航海家扬帆远航，探索世界，是受到马可·波罗的鼓舞和启发。意大利的哥伦布，葡萄牙的伽马、鄂本笃，英国的卡勃特、安东尼·詹金森、约翰逊、马丁·罗比歇等众多的航海家、旅行家、探险家读了《马可波·罗游记》以后，纷纷东来，寻访中国。

事实上，美洲大陆的发现纯属意外，因为游记的忠实读者哥伦布原本的目的地是富庶的中国。为了寻找“遍地是黄金”的中国，而陆上丝绸之路又被奥斯曼帝国和阿拉伯人所控制，而古代希腊人就开始怀疑地球是圆的，欧洲人便开始了海上探险，企图绕过伊斯兰教控制的地区，从另一边绕道前往中国。他们本不知横在欧洲与中国之间的还有一个美洲，只是在航行中才无意间发现了这个新大陆。